

6 读书 READING



一位野生动物摄影师的自然笔记

■本报记者 胡珉琦



去看、去听、去闻、去抚摸、去感受……

拍摄野生动物首先是一门技术活儿。想要拍到它们,你得会找,还得会等!

跟很多人一样,在野生动物里,耿栋最喜欢的还是萌萌的大熊猫。2008年,他特别幸运地接到了一项拍摄任务,为国际野生动物保护机构——“保护国际”拍摄野生大熊猫的影像。

此后,他每天八个多小时在竹林里穿行,走遍有可能碰到大熊猫的位置点。可刚开始的时候,耿栋简直“笨”又“瞎”。

野生动物出没的兽径哪是给人走的,他只能双手着地、四肢并用,像动物那样行走。别看熊猫那大块头,圆滚滚的,却能在竹林里神出鬼没,人类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密密麻麻的竹子挡住了绝大部分的阳光,所以大熊猫隐居的地方非常幽暗,耿栋根本看不见。要不是有经验的向导引路,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跟它相逢。

他问向导:“那么黑的林子,你怎么看得到大熊猫?”向导很诚恳地回答:“看不到!是听到的。先听到大熊猫咬竹子的声音,再顺着声音去寻找。”

前段时间被网友刷屏的BBC纪录片《大猫》,拍到了雪豹。雪豹是雪山之王,活动面积非常之广,是出了名的难找。摄制组在喜马拉雅山作了几个月的准备和等待,才终于追踪到一只雄性雪豹。拍摄花絮中,女导演在发现这只雪豹的那一刻不禁喜极而泣。

可要是和耿栋比惨,那都不是事儿。2011~2014年,耿栋团队花了四年的时间在青藏高原拍摄纪录片《雪豹》。他跟着乔治·夏勒和吕植,仔细搜寻雪豹的粪便、尿液、脚印,可这些特别“美好”的东西,始终没能给他带去好运。四万公里路的总行程,耿栋愣是三次与雪豹擦肩而过!

这悲催又难忘的经历并没有让他放弃寻找。2015年,他加入珠峰雪豹调查和拍摄团队。先是跟着科学家通过红外相机捕捉到的画面,

30多年前,中国的生态摄影几乎是片空白之地。第一位能被中国人记住的生态摄影师,是云南大理的奚志农。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拍摄的纪录片《追寻滇金丝猴》在国际多个电影节斩获大奖。在那之前,奚志农已经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野生动物节目《动物世界》的摄影师之一。

十几年后,他遇到了当年《动物世界》的忠实粉丝耿栋。那是在2003年,耿栋刚刚开

始进行野生动物摄影的野外实战。他先后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关掉了人像摄影工作室,一头扎进拍鸟的队伍里。他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奚志农对他说过话,“中国的野生动物影像太少了,需要有更多人加入”。

对耿栋而言,另一个转折来自现在已是妻子的女朋友,一位自然保护工作者。正是在她的邀请之下,耿栋参与了四川的鸟类保护工作,这才有机会跟随生态科学家徐凤翔

和探险家杨勇第一次走到了野生动物天堂云南西部,正式开始了自然摄影之路。

17年的时间,耿栋在《中国国家地理》《华夏地理》《中国科学探险》等杂志发表了多部作品,由他担任制片人、野生动物导演、摄影师的纪录片《雪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得了多个纪录片金奖。《从大熊猫到雪豹》这本书记录的是耿栋这些作品背后的自然观察,以及他对荒野的回忆和感悟。

《从大熊猫到雪豹》,耿栋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分析雪豹的互动规律,寻找和辨认哪些是它的“行走路线”“不猎场”“信息交换地”……剩下的就只有等。

当时,团队有位神队友对耿栋说:“耿栋,你每天下午四点半出门,到那个山谷来回转,就有可能拍到!”

于是,他真的每天四点半就准时到队友指定的地方去转,一圈一圈,日复一日!

直到一天傍晚六点多,在一处两边陡直的峡谷内,转过一处河湾的拐角处,一只雌雪豹带着两只小雪豹同时出现!

在那么难以到达的地方,耿栋和雪豹终于有了一次超乎想象的“世纪会面”。这也让他成为了第一位在西藏拍到雪豹4K影像的人。

野生动物摄影这份工作,尽管常常让人陷入窘境,可又实在是多姿多彩。它不仅能看到自然的无限多样性,更在于它大大拓展了人的体验。自然不会语言,耿栋说,你只能去看、去听、去闻、去抚摸、去感受,甚至得像动物一样去思考。

摄影的力量是要讲好一个故事

2008年之前,耿栋就重点关注了中国西部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拍摄了大量的野生动植物影像。2005年,他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额奖学金,赴印度学习“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教育”。

可回来以后,耿栋反而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担忧。自然摄影的最终价值不是作品本身,它是要回馈自然的。耿栋意识到,一个人的图片,如果不考虑传播,哪来的力量!

于是,他开始主动参与国际NGO组织的保护项目,2009年还正式成为了北大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传播官。

他的工作发生了一些转变,他不仅要拍,还要千方百计想办法让更多人知道他们正在从事的保护事业。这也意味着,他得学习如何向公众讲好一个故事。

很多人理解的野生动物摄影,拍摄物种的级别越高,它们被捕捉的动作、行为越特殊,就越具有吸引力。但在耿栋看来,真正优秀的野生动物摄影,不在于你拍摄的地方多隐秘,拍摄的对象多稀有,而在于你是否足够了解它们,能为它们传达生存背后真实又丰富的故事。图片作品的展示性的确非常显著,但有时

候信息量是有限的。

《从大熊猫到雪豹》里有一张很不起眼的照片,雌血雉带着一只血雉宝宝正躲藏在一条排水沟里。血雉的羽毛看上去大体是黑色的,再加上四周阴暗的环境,稍不留意,你就会错过它。

可跟照片的色彩、氛围相比,它的背后有一个很温柔的故事。

当时,耿栋和几个同行正坐车行驶在卧龙的盘山公路上,突然有一个黑影急速地穿过马路。是一只雄血雉。摄影师下车查看情况,没想到到这只血雉杀了个回马枪,直奔人而来,显得非常生气。

这种行为在野鸟类中很不寻常,不但不跑,反而有挑衅的架势。他们很好奇地下了车,匍匐前进一步观察它,结果不远的丛林又出现了一只雌血雉,翘翘下还护着四只血雉宝宝。

原来,这对血雉夫妇是想带着宝宝们从寒冷的高海拔迁移到低海拔地带去,在搬家过程中,要越过被盘山公路分割了的林带,可宝宝太小了,无法跨越半米宽的公路排水沟。

“我们的经过,正好干扰了它们护送雏鸟越过排水沟。”耿栋意识到,原来夫妻俩的疯狂举动都是为了舍身救子,只能频频出现,把人引开,远离自己的孩子。

人的出现给本来已经很困难的血雉一家火上浇油。经过短暂的讨论,耿栋他们还是决定什么也不做,然后赶紧离开,不给他们额外的压力,让它们一家子自己渡过这个难关。

其实,与图片相比,文字也并不都是无力的。要是再加上可以连续拍摄的影像,那么展示一个完整的野生动物的故事就有了很大空间。耿栋开始用笔和摄像机来创作作品。他的《年宝玉则的观鸟喇嘛》获得了2011年度最佳环境报道奖。他还拍摄了《丛林之眼》《熊猫列传》《熊猫蜂蜜》《王朗森林纪事》《象之家园》等多部影视作品。

目标发生转变时,理解的视角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耿栋真正意义上被大众所认识和了解,是因为纪录片《雪豹》。这部纪录片很有意思,名为“雪豹”,但它并非唯一的主角。耿栋选择和人文历史纪录片出身的导演周兵合作,他们要展示的不是雪豹本身,而是由雪豹、牧民、喇嘛和保护生物学家交织在一起发生的故事。而这也形成了它有别

于其他自然题材纪录片的独特视角。

保护之难,根本在于生态环境与当地社区生计发展之间的矛盾,任何脱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保护都是片面的。野生动植物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种保护与延续的问题,也是如何与当地百姓共存与发展的课题。因此,回归到当地百姓所熟悉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立场,才可能创造出合理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不得不说,这部纪录片背后所蕴藏的创作者的思考,深深地受到了夏勒和吕植“建立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和管理体制”的理念影响。耿栋从图片到用文字讲述图片故事,最后还拓展到了影像叙事,去讲述一段与人有关的自然故事,每一次转变都离不开这些科学家的指引。

自然不仅仅在钢筋水泥世界的边缘

2014年开始,耿栋开始专职从事纪录片的策划与制作。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面是荒野,一面是城市的生活,让他有些挣扎。“只要去到野外我就振奋,回到北京就变得消极”,他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面前不停地进行着思想斗争。

但现在不会了。耿栋说,“我已经可以一天之内完成两种模式的无缝切换:去野外露营、徒步、隐蔽、蹲守、拍摄,回到家洗衣服、整理器材、陪伴父母妻子女儿。我的皮肤黑了又白,白了又黑,衣服破了又破,鞋换了又换,灰白开始爬上鬓角”。

因为他和朋友们努力,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和关心自然界物种的存在与未来。终有一天,他们也会行动起来,让那些生命变得有希望。

2016年,耿栋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他策划了一部名为《自然—北京》的纪录片。他想讲述在不断发展的北京城市中,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麻雀、喜鹊等鸟类的故事,月季花和菊花的故事,麝鹿的故事。

其实,不仅仅存在于钢筋水泥世界的边缘,就在这个世界的中心,就在城市人的身边,也有自然的天堂。它们更需要科学家的研究、老百姓的关注和了解。只有把人们生活区域的自然环境了解彻底,保护好了,才有可能保护更广阔的荒野。至于耿栋的下一个梦想,他希望能是自然电影!

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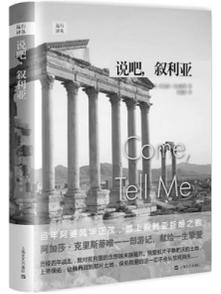
《我的孤独是一处花园》:阿多尼斯诗选,叙利亚阿多尼斯著,薛庆国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

“大马士革的茉莉花,没有利齿,没有头盔。”本书是阿多尼斯作品的首个中译本,收录了诗人从上世纪50年代“最初的诗”到2008年的最新作品,时间跨越半个世纪。

享誉世界的诗人阿多尼斯,出生在叙利亚一个海滨村庄。因为贫穷,他13岁时尚未进入学校读书,但庆幸的是,父亲虽是农民,血液里却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在父亲的引领下,他进入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奇妙世界。

然而因为战乱、政见不合等种种原因,在1956年,他却不得不以流亡者的身份前往邻国黎巴嫩谋生。此后便定居在黎巴嫩,创办杂志,在大学任教。“阿多尼斯是阿拉伯世界的伟大诗人,他之于现代阿拉伯诗歌的意义,恰如艾略特之于现代英语诗歌。”这是挑剔的西方评论家们对他的巨大褒奖。

祖国与民族不幸的现状,是阿多尼斯忧伤与悲愤的根源。诗人长年寄居他乡,素以“精神上的流放者”自居。然而,在他心目中,真正的流放地却“只有在写作中,尤其在诗歌中才能找到。”他在诗歌中诘问战争,书写着自己的愤怒、悲悯、批判和希望。



《说吧,叙利亚》,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何羲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本书是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游记。

1930年,命运安排年轻的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万和当时已负盛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相识,但阿加莎的名气并未阻碍她分担丈夫的工作。她参与了马克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每一场发掘,与他同甘共苦,在考古学家遭遇的各种灾难事件中不断俯仰笑料。

她爱她的丈夫,对考古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朋友问起她的异乡生活时,她决定用这部轻松的游记来告诉他们答案。本书初版于1946年,描绘了考古旅途中的艰辛和乐趣,从中能体会阿加莎独具的魅力。(喜平)

我们终将赢得抗癌之战

■本报记者 张文静

4月15日至21日正值第24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肿瘤防控学术论坛、专家义诊、专业咨询、科普讲堂等一系列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提到癌症,不少人闻之色变。作为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癌症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人们的头顶。然而,与这种巨大的恐惧相比,人们对癌症本身却往往知之甚少。癌症是怎么产生的?医生为何会使用化疗等方法进行治疗?癌症治疗迄今取得了怎样的进步?癌症能被治愈吗?

《癌症的消亡》一书正是要解答人们的这些困惑。本书作者之一文森特·T·德维塔是国际知名的肿瘤专家,他是现代化疗的开创者之一,并因此获得过拉斯克奖。他还曾担任过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和美国癌症学会主席。另一位作者伊丽莎白·德维塔·雷伯恩则是一位科普作家,也是德维塔的女儿。

虽然要回答关于癌症的种种问题,但父女俩合作的这本书却不像一本癌症教材,而更接近人物自传。“作者通过亲身经历的一个个故事,生动而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了他在数十年职业生涯中的心路历程,也向我们介绍了化疗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一个个突破。”

“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作者为代表的化疗先驱遇到了来自社会、政府甚至同行等方面的阻碍,但在字里行间我能够体会到,他们一直没有放弃‘癌症可以战胜’的理念。正是这种坚持极大地改善了癌症治疗的现状,使我们现在能够真正看到战胜癌症的曙光。”本书译者、医学博士桂林表示。

提及为何要写作这样一本书,德维塔在引言中写道,自1971年《国家癌症法案》签署后,美国就拉开了抗癌之战的序幕,40多年过去,美国累计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从如此巨大的投资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很多人会说,我们已经完败!癌症患者还是一样会死,即使投入再多的钱也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我要说,你们错了。”德维塔写道,作为一名癌症专家,同时现在也是一位癌症患者,他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终将赢得抗癌之战。“我们已经拥有了根除癌症的工具。就在不久以后,癌症将不再是一个令人极度恐惧的词汇。

同时我还会告诉你们,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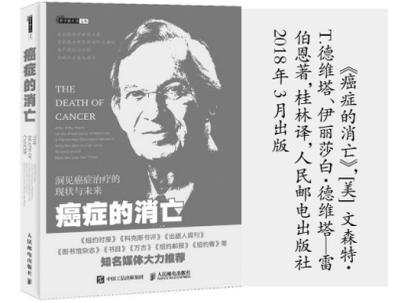
在德维塔看来,虽然现在人们仍然会罹患癌症,也会因此而去世,但与抗癌之战刚刚开始时相比,大量原本会因为癌症死亡的患者活了下来。同时,那些残忍的、损毁外形的手术被创伤更小的手术方式、靶向放疗以及新的药物治疗所取代。而且,我们在基因和分子水平对癌症的发生机制以及癌细胞的行为了有了深刻了解,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令人惊喜的新型治疗方案。

德维塔认为,目前癌症防治所面对的障碍绝大部分已经不是在于科学层面,而是医生们往往固守过时的治疗策略以及医生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官僚斗争。

“这些问题在医生和研究人员的内部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大部分人们都不愿意公开谈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伤害同事,减少自己获得拨款的机会或者会触动强势的FDA。”德维塔写道,事实上,当他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同事劝他:“文斯,你不应该有这个想法,公众没必要知道这些故事。”

但德维塔并不赞同。在他看来,纳税人应该知道他们为抗癌之战所提供的资金是如何花费的,那些癌症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也有权利了解现在有哪些治疗手段是有效的,以及如何确保获得这些治疗。“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德维塔说。

这些想法也让同样身在医疗领域的桂林深有感触。“我尴尬地发现,作者所强烈要求摒弃的许多过时理念和做法,包括为了减轻化疗反应而减少化疗药物剂量、延长化疗间隔,在我们的周围依然存在。很多患者对癌症治疗手段的最新进展一无所知,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无助甚至绝望。因此,我渴望将本书推荐给我的医生同仁和患者们,促使癌症治疗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改观,也希望它能够坚定同仁和患者们战胜癌症的决心。”



《癌症的消亡》,文森特·T·德维塔、伊丽莎白·雷伯恩著,桂林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如何让机器人担当起道德责任?

■李佳欣

在面对多个目标的过程中提供一个明确的行动方案。

因而,该书认为应该将这两种进路结合在一起,从而尽可能使得机器人在法律、道德等因素上符合社会的规范,朝着更为人性化的AMAs方向迈进。

但是在关于伦理道德的方面,该书明确表示“人工系统是否能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这并不重要。关于这一问题,该书引入了弗洛里迪的信息伦理学观点,弗洛里迪和桑德斯认为可以通过参照那些人类社会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来为人工智能体设定一种道德阈值函数,阈值的高低作为衡量具体行为是否道德。

他们将责任进行分隔和形式化,并澄清它在道德中的角色,即通过区分“道德问责”和“道德责任”来调控、规范并改善自主性智能体的行为。《道德机器》一书虽然认同弗洛里迪理论所带来的解放研究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对其在道德机器具体实践层面上的可行性表示怀疑——道德规范是怎样符合伦理,尚不得知。

不过作者似乎赞同这样的看法,“主动定期召集专家和关注这些问题的公众成员,勘察数字技术提出的现有问题和即将到来的一系列算法规则,把这些规则植入机器人的‘大脑’,从而获得‘认知’;自下而上式的发展进路则是通过模拟孩童的成长过程,让机器人在不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习得复杂行为与认知的能力与知识。

这两种发展进路都存在一定缺陷,对于前者而言,虽然其运行模式更为“安全”,却常常意味着很难达到的理想标准……还包含着难以落实的计算复杂性”;后者则难以

来所面对的问题正以各种各样可能的复杂形式进入到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并且是非常迫切与重要的。

比如关于性爱机器人所引发的伦理争议,其中所谓的“合乎道德的适当行为”像道德主体一样行事”是否“适当”或者说“是否真的存在”,是以前一个问题——性爱机器人是否能够作为真正的道德主体——为基础的,也就是,这种(或可称之为未来的)道德问题已经进入到了当下人们的伦理生活中,并且它确实是在我们可操作的范围之内的(比如我们能够对之进行设置道德阈值)——科学家们是能够在开发更加智能的性爱机器人和禁止这一方面的研究之间作出选择的。

但在此处,弗洛里迪的信息伦理学并没有告诉我们“道德阈值”在这里意味着什么?究竟怎样做才符合道德?无论是本书的两位作者抑或其他学者,相信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并非轻而易举,毕竟会牵涉到不同民族文化与信仰等相关问题。

而与此同时,关于“道德阈值”的讨论还悬而未决,但关于这一方面的人工智能技术却已经突飞猛进,其所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姿态——等性爱机器人研制成功甚至投入使用之后再再来讨论其引发的伦理问题的时候,已经造成了一些棘手的家庭婚姻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对在未来可能引发道德争议的问题进行预先考虑,尤其是一些关系到人类生活的核心主题——婚姻、两性等问题,应当始终抱以审慎的态度。换言之,如果AMAs在未来会以相当大的数量进入我们的生活空间,那么将其纳入伦理反思的领域势在必行。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阈值”大小的数字标准问题,也不只是AMAs研究人员和认知科学家以及道德哲学家的任务,而是需要所有关心人类生存发展的有责任心之人都来贡献一份自己的智识力量。

《道德机器:如何让机器人明辨是非》, [美]温德尔·瓦拉赫、科林·艾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